

中国农业经济史研究脉络及当代启示

——评《王毓瑚农史讲义存稿》

叶楠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6-0138-02

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赶超与民族复兴的发力阶段,厘清作为农耕文明古国的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脉络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妨循着近现代农史学科开拓者“东万、西石、南梁、北王”之一的王毓瑚(1907—1980)先辈的治学足迹,通过《王毓瑚农史讲义存稿》一书(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了解、熟悉并掌握中国农业经济史的发展脉络。

《王毓瑚农史讲义存稿》是在先生遗留的讲义稿的基础上整理完成的,由其哲嗣王京阳研究员提供,被列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文化传承系列丛书”(丛书全套共6册,其余为《农业经济学》《粮食问题》《许璇纪念文集》《农业经济管理研究论文集》《农业经济史研究论文集》)之中。全书由三大部分构成,分别是中国农业史纲要、中国农业经济史大纲、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讲义。王毓瑚早期从事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研究,后致力于整理、校注古农书及农业经济史、农业技术史研究,肇端于比较农业史、农学思想史、世界农业史研究。先生学贯中西,曾求学德、法并擅长中西比较研究,是我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尤其在农书古籍整理校注及农史教学、农史文献研究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该存稿弥足珍贵,它既是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先生开创及推动农业历史学科发展的见证。

公元前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我国黄河流域的先民已经开始从事农艺活动,但活动区域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还不是很大。初期的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黄河下游及渭水中下游一带。殷人的耕种方式可能已脱离原始的掠夺式经营方式,但仍然较为粗放,普遍实行烧田法。殷代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主要是奴隶(甲骨文中的“众”)。周代“以农立国”,即以推广农业为手段巩固并发展其统治势力,并逐步开辟了新的田制,及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情况下兴修水利。另外,周初“东殖”将整个东方划为农业文明区域。周人的直接生产者“庶人”,其已摆脱了奴隶的身份,但土地仍归贵族阶级所有。直到春秋末期,对土地的占有已不再是贵族阶级的特权,而是任何人对土地都可以“私有”,土地“自由”买卖随之开始。到东汉末年,“小农社会”基本形成。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与多子继承制建立,农本主义诞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中国俨然发展成为农业帝国,其时的农业政策与措施大都成为后世典范。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及西晋永嘉南渡,北方农业开始走向衰弱,长江流域的农业因大量人口南徙而迅速发展起来。等到隋唐再度大一统时,农业发达地区得到极大扩展。唐宋时期地权的集中与分散经营比肩而进,黄河三次改道使得北方农业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全国农业生产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的水田区,传统农业的特征得以充分体现,土地问题较为突出。尤其从农业地理的观念出发,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变化——与山争地、与水争地。北宋以后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元明清三代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普遍实行屯田,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小农经济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从鸦片战争爆发、全国农民大起义、洋务运动,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再到

【收稿日期】2022-10-15

【作者简介】叶楠(1981—),男,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考古研究。

国内革命战争,直至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完成,整个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以农民为革命主力。其中,西方资本主义一度影响中国封建农业经济,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的土地纲领不能解决我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土地改革才能使我国农业生产、农村生产力获得迅速恢复与发展,才能使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逐渐摆脱贫困面貌而走向繁荣。

通过中国农业经济史的学习,我们首先应更加坚定今后发展农业的信心和决心。农本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肌丰骨秀,这是我们要发展农业的根基所在。《礼记》指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其进一步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其次应稳固农村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小农经济及由此孕育的家国情怀,是中华农耕文明得以永续发展的源泉。再则,长期实践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农学,以农时与耕作作为其首要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向自然进取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神。最后,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史上的历次辉煌应归功于中国劳动人民。由古推今,当前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大潮,正是中国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的积极表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由一个传统农业大国阔步迈向农业强国,早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王毓瑚认为,学习农业经济史的目的在于能够更好地解决当前的农业经济问题,在于提供给我们以必要的历史方面的参考资料与经验教训。围绕中国农业经济史的演进,《王毓瑚农史讲义存稿》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式发展的密码,其认识不仅深刻,而且具有开创意义。

(责任编辑:胡文亮)

~~~~~  
(上接第137页)

栽培、加工一直延伸到作物文化的综合性系统研究,并延伸至桑、蚕起源探讨及其历史文化。论述有从全球科技史视角来看待中外农业技术对比研究,也有聚焦某一地区出土作物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亦有地区农业史研究、农业技术史研究、拉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等多个领域。

通过研讨会上双方学者的精彩报告,得以窥见中国和拉丁美洲农史学界的研究特点与趋势。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研究,于深度和广度等方面的不足值得中拉两地学者作进一步思考。其一,以大豆、蚕桑等农作物和农业产业为主体展开的起源、发展研究,可以从中国原产物种的传播、交流方面入手,凭借美洲作物来华传播与作用研究的成熟经验,就中国作物与农业产业的海外传播、交流作深入挖掘;其二,受限于地区大环境,拉美农史学者研究视野多聚焦于所在国家或单位所属地区,较少出现拉丁美洲的整体视角。拉美各地区之间农作物的传播、农业文化的交流互动以及在地学者对诸如“大豆”等外来作物的研究有待补充。其三,中拉农史研究者特点鲜明,又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亟待双方开展进一步的交流活动推动融合。国内农史学者基于文献研究法,以多样视角观察全球作物起源,但在面对海外起源作物时往往难以结合最新的考古资料进行论证,而拉美农史学者的本土文献稀缺更依赖考古成果进行研究。借助“一带一路”、中拉命运共同体以及“中拉联盟”搭建的农史桥梁,两地学者或许可以打破考古工作中存在的地域、国别隔阂,推动中拉农业考古研究的全球化。

此次中国—拉丁美洲农业历史国际研讨会展示了中国和拉丁美洲农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中拉农作物在起源、传播等领域继续深入研究,中拉两方都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带动更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入中拉联盟,促进科研机构和国家农业部门层面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拉联盟农业教育科技合作。

(责任编辑:徐定懿)